

16 14

南召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召县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编印

南召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召县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编印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出版

《南召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

顾 问： 李顺堂

主 审： 陈中明

主 编： 侯春杰

副主编： 卢中州 赵广庆 郭江源

编 委： 吉光远 孙镇超 李兆祥

申清夫 宋光禄

南召文史资料 第14辑

印 刷：南阳市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5

字 数：110 千字

印 数：800 册

豫内资宛新出通字〔2006〕12 号

内部交流 免费赠阅

目 录

特 载

一段难忘的历史

- 文革前南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若干政治运动梗概 吉光远(1)
- 爱教敬业的王国林同志 张纪功(19)

烽火岁月

- 开明人士李克元 王峻岱 赵广庆(22)
- 抗美援朝运动的回忆 孙镇超(27)
- 抗日战争时期的丹霞寺 黄学林收集(34)
- 日寇在南召刘村犯下的罪行 郭树明回忆 郭江源整理(35)
-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我的母校南召县现代中学 郭一萍讲述 郭江源整理(39)

金融春秋

- 回顾南召金融业四十年 包荣祥(48)
- 解放初期的南召金融工作 暴葆玉(54)

科技之光

- 南召辛夷科研与规模发展概况 高聚堂(58)

放射性同位素在南召柞蚕业上的应用	闫道勉(62)
古今南召蚕业教育综览	郭江源(68)
红薯及品种改良在南召经济生活中的位置	孙镇超 李荣祥(78)

风雨人生

风风雨雨六十年	刘长松(84)
我在甘肃的求学经历	杨圣华(103)

艺苑忆往

曹店旧时灯节	赵德钧 王书彬(106)
崔庄乡民间文艺调查	黄学林(108)
云阳镇西关民间武术	刘万和(111)

南召人物

爱国台胞李湘涛事略	卢中州 闫 勇(113)
-----------------	--------------

往事回溯

南都中学历史变迁	艾廷和 闫 勇 郭江源(119)
历史名镇南河店史迹留影	黄学林(130)
建国初期南召县的物资供应及百货公司的建立	高 源(140)
南召山庄农业社建社初期的一段回忆	王明聚(143)
留山镇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顾	李兆祥(147)
我在基层工作经历的几件往事	尹林春口述 赵广庆整理(151)

一段难忘的历史

文革前南召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及历次政治运动梗概

吉光远

一、引 言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错误。总的来说，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的不谨慎”（邓选 266 页）。“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的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占世界总人口近 1/4 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邓选 263 页）。

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千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把建国后“文革”前十七年的工作做了精辟分析和正确结论。南召县的党政组织是在党中央及省、地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所以我们县在这个时期的各项工作情况同小平同志讲话及“决议”内容完全一样，亦无例外。

“文革”前的十多年，我县经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阶段。并围绕着每个阶段任务的实现，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开展工作。第一条战线是社会层面，第二条战线是干部队伍层面（也就是历次开展的政治运动）。

二、文革前十九年我县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1、开展民主革命，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封建残余势力，创建、巩固、发展新生政权和地方武装，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1947年11月，南召解放，以南召地下党员申瑞祥等同志为基础，立即建立了中共南召县委（对外称政治工作委员会，书记叫政委）、南召县人民政府和县大队、县农会，紧接着就连续建立了八个区委、区人民政府、区农会和区基干民兵连。尽其所有的县区干部，深入农村访贫问苦，依靠贫雇农，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反霸、反土豪劣绅、急性土改等工作，赢得广大群众的热忱拥护和支持，从而巩固发展，壮大了县、区、乡民主政权和县大队、区基干连、乡民兵组织。

1949年春解放军南下，途径南召的东半部，遂在云阳镇（现蚕场大院）建立了南召县“支前司令部”。王毅任政委，李萍（即尹皓春）任司令员，下设四个科室，我在供应科当办事员。六月份完成了数十万大军南下的支前任务。大军过后，潜伏深山的土匪头子郭西峰、朱老末等股土匪，经常骚扰群众，破坏基层政权。因此，上

级派警二旅进驻南召,加上县大队、区、乡民兵,对相当数量的土匪进行武力围剿,1949年底完成了清剿任务,进一步巩固了各级政权,稳定了群众情绪,保障了广大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此时我在崔庄乡“鱼池粮草供应站”、张春同志在“洞街粮草供应站”负责对剿匪部队的粮草供应工作。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日子,我县在县城原文化馆大院举行了有三四百人参加的建国庆典大会,会议由县长郝岗主持,县政委刘文澍致祝贺词,会后还进行了游行,满街鞭炮齐鸣,小红旗随风招展,秧歌、舞狮子的都出动庆贺。我是受县财粮科通知回县城参加大会和游行的。1950年初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大纲”先后在县政委王毅、樊一起同志的主持下在全县农村正式进行“土改”,年底结束。其主要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打击地富阶级。在经济上没收地富阶级的土地、房产及其浮财,分配给贫雇农及不足平均线的下中农。在政治上对地富分子实行管制、劳动改造。1951年春节过后,县又组织县、区大批干部,混合编队,在皇路店、板山坪两个区共搞十个乡的土改复查试点,此次我作为工作组组员在皇路店街搞,麦收前结束。与此同时,县又派时任南召团县委副书记李育林等四位同志在留山区土门乡搞颁发土地证试点工作。1951年冬,土改复查及颁证工作同时进行,年底全面完成。在土改复查的最后阶段,还专门搞一段乡级政权的民主建设,选举产生了乡农会及乡政府组成人员,全面完成了乡级政权的民主建设工作。在这个阶段县政府依公安部“镇反令”,全面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各区均建立了人民法庭。经过审判、报批等程序,对现行的、历史的反革命分子,根据罪恶大小,分别实行管制、劳动改造、判刑,从而进一步稳定了社会大局。1950年冬,美帝侵朝,我县根

据上级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抗美援朝宣传活动,并完成了一架“南召号战斗机”的捐献任务。此外,还顺利地完成了历年夏秋两季的农业税征收任务,壮大了县财政实力,保障了后勤供应。

2、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三大改造

1952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企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此,在农业方面,南召县委采取书记动手、全党动员,派出大批国家干部深入农村,依靠贫下中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先搞临时互助组,后发展为常年互助组,又转化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继而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加强对农业合作化的具体指导,县委增设了农村工作部。在互助合作化中间,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对一些行动迟缓、互助合作发展缓慢的区、乡领导作为“小脚女人”、“右倾思想”来批判,从而加速了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为了摸索经验,县委把董店乡作为农业互助合作化重点乡,县委书记郭照普及一些有能力、积极肯干的同志常驻该乡。

农业互助合作社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互助组时期基本上是公平、对等的换工性质。合作化时期基本上是“工分”制,即把每个劳动日定为十分(也有按件计工,大包干记分),按照出勤多少计算出每季每个劳动力的总工分,然后按照每季粮食产量多少,扣除种子、耕牛饲料、上交任务及少量的人头粮后,计算出每个劳动日平均数量,进行逐户分配。副业收入也是类似办法。当时,我在留山区工作,时常驻潘寨乡迁学德互助组,调县后,常驻韦湾乡的小东沟农业合作社。手工业方面的改造,是在县委领导下,由手工业县联社具体实施,采取了由低级到高级类似农业互助合

作的形式稳步发展。在商业方面,由于南召县城划为农村经济范围,故由县区供销部门具体负责,对私人商业实行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切货源,全部由国营的八大公司供应。在工业方面,我县基本上没有工厂,仅有一个铁厂,故仅对该厂逐步实行公私合营一直到地方国营,后改名为县机械厂。经过几年的工作,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全县的农业、手工业,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统购,就是对农民留足口粮后的余粮,由国家粮食部门统一收购;统销,就是对农村缺粮户和非农业户采取以人定量,凭购粮证或粮票由粮食部门分月供应。我们县的粮食“双统工作”是1953年冬开始进行的。是年春,我县普遭霜灾,麦苗严重萎缩,群众情绪不稳,不法分子乘机造谣破坏,出现了抢购和囤粮现象。县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一方面稳定群众情绪,一方面打击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同时开展抗灾保苗运动。在上级的支持下,从四川省运来一批大米,暂时缓解了县内粮食供需矛盾,稳定了群情。根据上级部署,1953年冬,县委召开了扩干会,贯彻实施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意义及政策,全面开展粮食“双统”工作,全部完成了上级给我县的统购任务,仅留山区此次完成统购任务80万斤。1954年又对棉花,油料实行统购和对棉布、食油的定量统销,凡属统销的商品,一律凭票购买。1955年初,县委书记郭照普、县粮食局局长牛立祥和在财委工作的我赴省参加“粮食三定三年不变”工作会议,回县后,经县委、政府研究决定,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布署“粮食三定”工作,即定产、定购、定销。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在全县农村搞了一个春天,五月上旬结束。以后每三年在原基础上调整一次,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生

产积极性。顺便说明的是粮、棉、油的“双统”是属于对小农经济改造和实行计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因霜灾所致。

3、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认真落实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1956年4月,毛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党中央提出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当时,全县经济平稳发展。1958年,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紧接着毛主席号召:“人民公社好”。上边又讲“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齐全”,还有上层领导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南召县委根据号召,组建了16个公社,300多个大队,3千多个小队,实行“队(指大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三级核算”,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与此同时,上级又提出了开展“大跃进”运动,为掀起跃进高潮,在口号上曾提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水平要超英赶美”。在理论上发表了“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文章。在思想上开展以批判“右倾保守”和反对“三气”(即暮气、娇气、傲气)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大批判。在内容上开展以“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大办食堂”为主的一些大办高潮,还限期完成除四害(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及扫除文盲等任务。在措施上对各大队劳力进行连、排、班编制,实行半军事化。公社可根据需要,统一调动劳力、物资,实行大兵团作战。到1958年秋末,全县基本上实现了食堂化,几个大办高潮也都形成。以上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当时简称为“三面红旗”。

为了体现大跃进的态势,上级号召学习外地的放卫星经验。所谓放卫星,就是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像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一样,出现奇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央和地方报纸登出了许多号

外喜讯。红色大字、鲜艳夺目，报导了不少小麦亩产七八千斤，水稻、红薯亩产几万斤，小土炉日产钢铁数千吨等“卫星上天”的浮夸消息。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论调。在这种思潮中，南召县的领导保持了冷静态度，不吹不擂，致使钢铁及粮食产量均落后于其他县市，屡遭上级批评。为此我们县也不得不“放卫星”了。根据整体工作动向，每隔几天，都要掀起一次不同内容的放“卫星”高潮，每次高潮，下边都要反一次右倾和暮气，特别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方面搞得更为活跃。尤其是大办钢铁，几乎是天天汇报，天天站队，站不上队的单位领导就是右倾，就要挨批判或靠边站。留山公社党委书记闫长林、姚玉良同志（女）就因为说实话有畏难情绪而被免职的。在几项工作齐头并进，几颗“卫星”同时待发的情况下，农村劳力出现了紧缺状态，这就不得不让老头子、老婆子、小孩子、小姑娘充当劳力，形成了男女老少齐上阵，连明彻夜闹轰轰，寒天不怕阴冷潮湿，热天不怕炎日当空，食宿工地或田间地头的场面。每次放“卫星”的任务都是高指标、高要求。高潮过后，只要汇报的好，就是“卫星”上天、发射成功。如果有检查团下来，就遍地插红旗，标语到处贴，口号连声喊叫，观后哈哈笑。即使这样，我们县在某些方面的工作仍处于下游，可县领导仍是冒住风险，对各公社领导不苛责、不强求，低调运作。1959年上半年，对“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过左的做法曾进行过纠正，后又因反“右倾机会主义”而更左倾了。

在一个至关重要的粮食产量问题上，县委书记郭照普、县长安庆章、副书记李元亮、郭其发、副县长李训培等同志为了应付局势，也不得不搞几次反瞒产活动，但都是轻描淡写，走走过场。尽管如此，某些社队仍出现了粮食透底。在那几年虽有丰收年景，但自然

灾害频发,致使粮食严重减产。这就使得很多食堂没粮食下锅,只得用瓜菜、红薯面、红薯干、红薯叶、人造淀粉等成为食堂做饭的主要原料,致使不少农民患上了浮肿病,农妇患上了子宫脱出病,很多耕牛皮包骨头瘦弱不堪。也有一些营养不良而引起疾病致使人和耕畜死亡的问题。这就严重影响了劳力、畜力出勤,致使农业生产、水利建设发生了严重困难。市场供应也异常紧张,广大群众的生活必需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完全凭票证供应。

1960年冬,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县委、政府根据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及时的改进了工作思想和工作要求。开展了“反五风”运动,几个大办先前已停下来,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调”和大兵团作战也停止了,水利建设做了相应调整和收缩。公共食堂也由大变小,直至后来的解散。同时党中央又先后发布了“关于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草案)和“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省、地委也下达了具体实施意见,县委派张向荣同志和我分别组成两个工作组,各搞一个生产大队的“小队核算三十年不变”的试点,向县委汇报后,县委研究决定召开有公社干部及各大队支书参加的扩干会,部署全面推广,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全部完成了由过去的以生产大队核算为主转变为以生产小队核算为主的任务,即由大集体转型为小集体。所谓“小队核算三十年不变”,就是把在全大队内曾经打乱使用的耕地、山坡、水利设施、耕牛等生产资料重新固定给生产小队,并以小队核算为主,期限为三十年不变。1963年党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草案),和“关于农村社教运动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据此,我县即连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先前叫整顿

三类队,后来发展成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至文革开始,四清运动停止。

三、政治运动梗概

本段谈的是开展的第二条路线工作(即在干部队伍层面)。为了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和对阶段工作的适应性和驾驭能力,开展了以下政治运动。

1、小整风运动。1950年10月初,南召县委根据地委安排召开了扩干会,参加人员系县、区骨干。重点解决急性土改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左比右好”的宁左勿右思想及强迫命令、粗暴行事作风。县政委王毅同志主导此会。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说服教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会议进行了五天。会后各区亦采取相同的方法解决一般区干及乡长、乡农会主席的思想作风问题,从而使广大干部提高了思想认识,转变了工作作风,对正确执行政策、顺利完成土改任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2、“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2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元旦,毛主席在中央政府团拜会上,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党中央为表达将“三反”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把参加过长征,时任天津地委书记、专员的蜕化变质分子刘青山、张子善“斩首示众”。霎时间,全国震动,人心沸腾,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在大中城市开展起来了。根据省、地委部署,是年2月南召县分两批开展“三反运动”。第一批是把大部分区干集中

到县,大部分县直干部在原单位,由县委书记樊一起同志统一做动员报告,副书记王如成同志具体负责,而后分组讨论。在动员时,明确提出三反政策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揭发受奖;检查从严、处理从宽;少数从严,多数从宽”。经过口头揭发与书面揭发;本人检查,小组帮助,对个别问题较大、态度不端正者实行大组帮助,而后集中问题,分析批判等过程,会议用七天左右时间结束。县直持续时间较长。第二批把剩余的人员全部集中到县,基本方法仍和第一批相同。对于极少数犯有实质性错误者也做了相应处理。相对而言,县以下问题较小,没有像大中城市那样“打老虎、装老虎笼”的过火做法。但也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防腐变质的能力。当时我在留山区工作,区领导利用劳改犯创收上交的收入给每个区干发一支金星钢笔,一律做价退赔。

在发动“三反”的同时,政务院发布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主要在工商界进行。在政策上除了和“三反”政策相同的部分外,又加了“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政策。南召县的“五反”是在“三反”基本过去,由税务、工商部门具体负责开展的。由于南召工商业不发达,所以运动开展得不像大中城市那样规模宏大,但也使工商业界受到一次深刻的职业道德教育。由于两个运动基本上是一时间进行。所以统称“三反、五反”运动。

3、审干及内部肃反运动。审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全县所有国家干部、职工、教师的出身、历史和社会关系进行全面审查。根据省、地委指示,1954年县委成立了“审干领导小组”,副书记安庆

章同志负责,下设办公室。组织部长史全欣兼办公室主任,侯自新同志为专职负责人,还有若干人员,负责审阅档案;决定审查对象,提供审查内容,实际是立案审查。另组织一部分人员负责内查外调,弄清事实真相,索取证言材料,写出书面报告。在方法上采取先易后难,先骨干后一般,先立案后调查,再结论,调查前听取本人陈述,所做的结论均与本人见面并获得本人表态。通过两年多的工作,对全县所有国家干部(含教师)的出身历史、社会关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系统的、详尽的审查。弄清了每个同志的政治面貌,为党组织使用干部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内部肃反问题: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肃反运动。其基本要求是“既不能左倾又要防止偏差。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使一个反革命分子漏网”。为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县委成立了肃反工作五人领导小组,安庆章副书记负责。审干办公室变为肃反办公室,又充实了一些公安人员。由于是在审干基础上肃反,情况比较清楚,所以较为容易进行。国家干部分两批集中,参加人员由单位党组织确定,并内定谁是动力、谁是对象,第一批大多数人员参加,第二批扫底,每批七天时间。亦采取宽严相结合的政策,开展揭、批、查与自我交待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先后两次会议均由县委副书记安庆章主持。中小学教师是利用假期,统一集中到方城师范大院进行。整个肃反工作自1955年开始,1956年底基本结束。事实上1952年就对一些怀疑有“历史问题”的同志分别集中到南阳接受审查。通过以上工作,进一步弄清了被审查同志的政治历史问题,使其放下包袱,振作了精神。至于在运动中带出的其它问题,则另当别论,真正定为历史反革命的为数极少。

4、反“右派”运动。1957年10月，县委根据省、地委部署，成立了整风运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1月中旬县委召开扩干会，县直干部全部参加，各区大多数干部参加。地委派农工部长安成美主导此会。首先由县委书记郭照普同志传达“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开展整风运动”的精神并作了简单讲话，接着是安成美部长作“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以帮助党整风”的动员报告。动员后，大家一边学习讨论，一边鸣放揭发。当时虽贴出一些大字报，但不少人疑虑重重，大字报内容比较平淡，鸣放高潮并未掀起。地委又派宣传部长何风德到南召，集中起来又做一次动员报告，其中讲到“现在的问题是怕字当头，怕这怕那，如果你是右派，即是潜在地洞内，也会把你揪出来，你不是右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鸣大放也不揪你……”。由于讲话针对性强，煽动性大，霎时间，人心浮动，思想开放，座谈会鸣放与大字报鸣放相互交替，深入动员与个别谈话相互结合，大多数单位鸣放气氛浓厚，高潮逐渐形成。各式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波未过，一波又起，但运动的发展仍是不平衡的。县领导对低潮单位和一些未鸣放的同志又进行再动员、再发动（包括个别谈话）。这样，各种意见和想法都提了出来，基本上达到鸣放的目的。县委随即在烈士祠召开由县领导小组挑选出来的骨干会议，宣布这些同志为各单位反“右派”运动的领导核心；宣布区别香花毒草的要点及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其中主要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并宣布运动纪律（其中一条是谁包庇“右派”谁就是“右派”）。次日召开动员大会，宣布反击“右派”开始。一个轰轰烈烈的以大批判为主、以面对面批斗为主的“反右派运动”开展起来了。到1958年春又进行一次“右派”复查（也叫